

《淺水長流 - 悼傅懋勳先生》 副題 ——我敬仰的前輩學者系列之一

這是本欄刊登的《我敬仰的前輩學者系列》的第一篇。原文是卅年前寫的悼念傅先生的舊文，是應他夫人，徐琳教授邀寫的。因此文刊在雲南省的一份雜誌，相信大家不易看到，故在本欄轉載。打印時，腦海中，傅先生的音容猶在。

中國語言學代表團，一九七九年第一次訪問法國。團長是傅懋勳先生。對某些人來說，這位團長有些土氣。可是這次見面，傅先生給我的印象，只是沒有“級氣”，也許這不是我慣見的團長形象。自後我和傅先生，在北京的幾次會面，他的作風還是一慣的。

他這種低調的學風，和他以集體事業為馬首是瞻那種品德，是一致的。我覺得傅先生，自五零年，在英國劍橋獲博士學位，於同年歸國以來，一直在作“遵命語言學”，有點類似魯迅先生，當年做“遵命文學”。我這樣說，當然一點也不帶貶義。比方，在少數民族調查方面，他按國家“先邊境，後內地”的指示，來決定他自己研究的方向。他為了應付分配給他的任務，而沒法抽空，整理早年，在田野工作獲得的，第一手資料和研究成果。他在劍橋寫的博士論文，《彝語描寫語法》，到現在為止，既沒有出版，也沒有翻譯成中文。大衛·伯德利（David Bradley 1979：380）這樣寫着：“彝語有多種源流。由於各種原因，不能包攝在這裡。至於傅（1950），劍橋大學章程的限制，使我不能引用。”傅先生卅多年前，寫的這篇論文，雖然在國外有人賞識，但仍埋沒於，一家大學的圖書館裡，而未能公諸於世。以傅先生的聲望，把自己的論文，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，當不會是件難事。可是他一直為大家忙，而無暇編譯。同樣的，他四十年代收集

的，有關納西族圖畫文字《白蝙蝠取經記》，到離他下世前四五年，藉着到日本作學術訪問，才能有些閒暇，把它編寫出來，在東京出版。這次出版，不單只晚了幾十年，在學術上，也對傅先生，增添好些額外的考驗。幾十年前的研究成果，現在才拿出來，和同業見面。要是當年田野工作稍不認真，是沒法經得起，這個時間考驗的。

傅先生太慷慨了。他為大家任勞任怨地，幹了幾十年學術工作。據他生前透露，他很想帶動一下，少數民族語言的比較研究。可惜一直沒有時間，去實現這個設想。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上，這個空白，有待別人去彌補了。

如今傅先生桃李滿天下，子女成材。聽說他生前未及整理的，都有人辦了。他在劍橋寫的論文的中譯本，大概將會出自他女兒，京起之手。先生在天之靈，當有所慰藉。

傅先生離開我們了。我覺得借用徐志摩的《再別康橋》頭幾句，來挽傅先生是很貼切的。

“輕輕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輕輕的來，
我輕輕的招手，
作別西天的雲彩。”

或許末句可改成，“作別東方的雲彩”。徐志摩和傅先生，是劍橋大學的先後同學。我懷疑是否，在劍橋小河裡划過船的，都會感染上這種清逸的氣質。

游順釗，一九八八年臘月於廣州

又：此悼文是應傅先生夫人，徐琳教授邀請寫的，曾刊在雲南的一份雜誌。徐琳先生當年，以一冊見贈。徐琳先生和她女兒京起，二零零三、零四年間曾到訪。兩年後，徐先生也歸道山，與傅先生作伴去了。

游二零零八年識